

# 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中的职业教育科研： 问题、成因与对策

杨旭辉

**[摘要]**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职业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提出了时代命题。职业教育科研“散”“弱”“虚”问题的产生,以及对职业教育发展实践的不重视、对职业教育历史承传的不自信和对职业教育学科认识的不到位有关。应该站稳“内立场”,解决职业教育科研“虚”的问题;研究“真问题”,解决职业教育科研“弱”的问题;生成“好话语”,解决职业教育科研“散”的问题。

**[关键词]** 职业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问题;成因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共同体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C2024255,主持人:杨旭辉)

**[作者简介]** 杨旭辉,博士,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5)0013-0041-09

2024年11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上指出:职业教育科研目前存在“散”“弱”“虚”的问题,与发展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sup>[1]</sup>如果以1983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立项职业教育第一个国家级项目为起点,职业教育科研已经走过了42年。无论是与基础教育相比还是就高等教育而论,职业教育科研的综合影响力和学科地位都与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的创新实践和发展成绩不相适应。高质量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供给不足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知识生产方式是核心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视域出发,对职业教育科研“散”“弱”“虚”问题的成因与解决路径提出初步思考,以期职业教育科研高质量发展抛砖引玉。

## 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内涵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2024年7月18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sup>[2]</sup>纳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上实践议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经验、观照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理性、整体性叙事,<sup>[3]</sup>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一是强调承传。“中国”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定语。民族性、主体性,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要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坚定历史自信,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不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另一方面又要面向未来,让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时代淬炼走上更高台阶,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中国贡献。二是面向实践。华勒斯坦在论述社会科学的起源时,深刻地说明了社会实践的作用:“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

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需求”。<sup>[4]</sup>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时代命题,也提供了广阔空间。三是建构体系。知识是成体系的思想产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学科之间和学科内部既合理分工又能形成研究合力,提出原创性、创新性的标识性概念。要统筹考量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关系,处理好学术知识生产和学科人才培养、教材体系建设、叙事话语传播的内在联系,尽快改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声音较小,走出“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

## 二、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职业教育科研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职业教育科研存在的“散”“弱”“虚”问题,本质是体系性、实践性、传承性不足。

### (一)职业教育科研“散”的问题

职业教育科研“散”的问题,本质是体系性不足。背后的认识根源是学术自由主义,有组织的科研落实得不到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表现。第一,研究力量的协同配合不够。无论是从学者个人、研究团队还是科研机构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科研的协作性都还相对有限。研究选题自发性强,研究实施更多以“点状”的方式开展,研究结论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研究团队之间缺乏建设性、制度性的学术协作,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缺失。第二,研究组织的使命导向不够。把有组织的科研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坚持使命引领,强化职业教育科研的国家意识、责任意识和荣誉意识。而职业教育研究者容易从自身的学术兴趣出发选择研究课题,缺乏对职业教育中长期发展的前瞻研究和对“硬骨头”问题的有效破解。第三,研究评价的统筹协调不够。时代需要的是能够代表中国在世界发声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需要中国

职业教育研究者能以世界听懂的话语,讲活中国职教故事、讲透中国职教逻辑、讲深中国职教文化。但目前的职业教育科研成果评价中,尚存在重“帽子”轻“里子”、重数量轻质量、重理论轻话语的现象。

### (二)职业教育科研“弱”的问题

职业教育科研“弱”的问题,本质是对实践关注不够。背后的认识根源是书斋化研究倾向,缺乏问题意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表现。第一,缺乏重大关切。“重大关切”(Great Concern)<sup>[5]</sup>是萧延中教授为准确界定问题意识而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意识不是“今天天气怎样?”意义上的“问题小词”,而应该是类似“钱学森之问”之类的“问题大词”。以这种视角看,职业教育科研缺乏真正心怀“国之大者”、回应“时代之问”,具有较强政策应用价值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第二,缺少实践价值。从成果运用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科研的服务对象主要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职业学校管理者、职业学校教师等。无论是在政策实践、管理实践还是在教学实践中,都有大量的问题等待研究者回应和解决,但由于实践可行性在评价研究成果价值方面的缺位,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地忽视来自实践的真正需求,乐此不疲地生产一些看似“高大上”实则无实现可能性的纯学理成果。第三,缺失普遍意义。凝练提出中国职业教育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是推动“职教出海”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学理化阐释和概念化梳理方面,职教研究者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试点”是中国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实践和关键治理逻辑。通过试点,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更好地统筹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生动体现。但在职业教育的研究实践中,很少看到这方面有理论说服力和较强传播力的研究成果。

### (三)职业教育科研“虚”的问题

职业教育科研“虚”的问题,本质是传承性不足。背后是研究预设的简单化倾向,缺乏理性

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表现。第一,简单化否定中国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进步价值。由于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职业教育伟大实践和优秀文化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久而久之造成研究立场上的游移或研究者内心深处的文化不自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分视而不见,对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却念念不忘。第二,情绪化放大国外职业教育经验的普适性。基于这种情绪,国际比较研究变成了国际经验改造中国实践的单向过程,缺乏向世界传播中国职教经验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而事实上,正如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于2024年11月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期间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所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源远流长,曾在世界文明史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sup>[6]</sup>对于西方理论,如果只是简单照搬照抄,缺乏基于中国情境和问题意识的筛选和论证,想当然地扩大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普适性,就会不自觉地对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的特殊性熟视无睹,造成学术研究上的水土不服。

### 三、职业教育科研“散”“弱”“虚”问题的成因

职业教育科研“散”“弱”“虚”问题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其背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乃至互动加强的结果。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视域看,职业教育科研“散”“弱”“虚”问题背后的成因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 (一)对职业教育的实践创新缺乏学理洞察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亟须强化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事实上,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一些学科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创造”,<sup>[7]</sup>很好地回答了“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问题,并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政策话语,被写进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

总体上看,教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水平不如经济学等学科。在教育学的各二级学科中,职业教育的自主知识水平也同样并不理想,这与职业教育科研的总体水平不高有关。

第一,研究选题的实践性不足。总体上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往往滞后于实践,甚至有脱离实践的危险。根据2024年11月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中国职业教育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广度还是深度、规模还是质量,都发生了“史无前例和鼓舞人心的变革”。<sup>[8]</sup>但与职业教育的实践创新和发展成绩相比,职业教育科研的水平和能级却不尽如人意。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从“概念”来到“概念”去,既无法对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促进作用,也无法对职业教育办学实践带来指导价值。<sup>[9]</sup>尽管中国社会科学的特点是知识“往往寓于实践之中,‘意’大于‘形’”,<sup>[10]</sup>实践常领先于理论,但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至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尤其应该聚焦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创新实践,凝练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标识性概念。比如,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度、专业目录管理制度、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创新,背后的学理意蕴和话语价值就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不强。职业教育学科建制的历史并不长,不少职业教育研究者由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领域转型而来,职业教育科研的方法论意识需要持续加强。首先,实证研究相对薄弱。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实证研究发展迅猛、势头强劲。无论是举办高水平学术论坛,还是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这些方面,职业教育科研应该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目前,全国尚缺乏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职业教育实证研究学术论坛品牌,也缺乏能够对实践发展起到价值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的实证性高水平研究成果。其次,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匹配度不高。在定量

研究与质性分析的研究方法选择上,存在“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倾向。学术发表场域中,不乏一些采用概念“轰炸”和所谓的方法“创新”方式得出一些不疼不痒的常识性结论的论文。事实上,无论是量化研究方法,还是质性研究方法,终究只是研究工具,不可过于迷信。究竟该采取何种研究方法,仍然需要回到研究问题上来,要特别关注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sup>[11]</sup>问题意识、价值立场,是选择研究方法的前提和基础,不能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前沿性而忽视更为根本的适用性。

第三,研究结论的操作性不够。好的研究,应源于实践亦归于实践。能否应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绩,是检验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从受众群体的角度看,职业教育科研的服务对象主要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职业院校管理者、职业教育教师等几种类型。与理论研究者更注重理念引介和逻辑论证不同,职业教育政策层面和实务工作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操作性、针对性强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职业教育科研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关于“双师型”教师的研究,应该超越内涵界定和概念辨析的初级阶段,聚焦认定标准、制度安排和实施方案等实务需求进一步深化、细化和优化。关于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应该超越理念思辨和学理论证的初级阶段,聚焦一线教师的育人需求和共性问题,更好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研成果,并进一步转化为让教师有感、可及的教学成果。在此方面,国外职业教育研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相对而言,国外很少看到以“职业教育学”方式命名的学术专著,更多见的是以“操作手册”方式命名的研究成果。比如,德国学者菲利克斯·劳耐尔和澳大利亚学者鲁伯特·麦克林主编、赵志群教授等翻译的《国际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手册》<sup>[12]</sup>就是以“手册”(handbook)命名。

### (二)对职业教育的历史承传缺乏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sup>[13]</sup>在职业

教育科研领域,文化自信的缺失主要源于对职业教育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与习惯性自我贬低。这种现象在中外职业教育比较研究中尤为突出。由于研究立场的不稳定性,研究者往往将中外之间的差异简单地视为差距、把特点异变为缺点,并进一步把近代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差距归结为文化缺陷。比如,一些研究认为“重道轻器”“学而优则仕”“士农工商”“重学轻术”等是中国职业教育固有的文化胎记,是中国职业教育无法赶超西方职业教育的文化性阻力。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性很强的文化。除了“重学轻术”,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知行合一”,除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分类,中国传统文化还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传承。此外,社会公众关于“尊师重教,师道尊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等观念的朴素认知,也会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把职业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简单、片面、想当然地归结为文化不良,既不负责任也十分危险。退一步说,即便中国确实具有所谓“重道轻器”的文化倾向,其真实含义也绝非刻意割裂“道”与“器”的关系,而是意在培养“兼备德艺周厚、通艺通道的‘中国式’博雅工匠”。<sup>[14]</sup>对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演进做简单的预设与抛弃性评价,无法解释传统中国何以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技艺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创造出众多光辉灿烂的杰出工艺品,也武断地割裂了新时代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文化脐带。

### (三)对职业教育的学科建设缺乏理性认知

与高等教育研究相比,职业教育研究的起点和机构设立都不算晚,但两者的发展成就却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社会影响力,还是学术期刊、学术平台的规格、级别和综合认可度,职业教育科研都不占上风。这反映了职业教育科研在学术研究范式和学科建设认知方面的缺失。

第一,把学科设置等同于学科建制。学科的英文翻译是“discipline”。实际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与“discipline”完全对等的词汇。“disci-

pline”的内涵,与汉语中学科、教学科目、学问分支、学术组织、领域、课程、纪律、规训、规范、准则等词汇都有关联。学科建设在职业教育科研发展过程中一直被高度重视、寄予厚望,这与学科概念本身的“成熟”含义有关。正如华勒斯坦所说,“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或真理”。<sup>[15]</sup>学科的成熟本质上是建制化的实现,它“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sup>[16]</sup>

关于学科建制的标准,费孝通先生以社会学为例,做出了经典论述。他认为,一门学科机构上大体要包括五个部门:一是学会。这是个群众性的组织,不仅包括专业人员,还要包括支持这门学科的人。二是专业研究机构。它应当在这门学科中起带头、协调、交流的作用。三是各大学的学系。这是培养这门学科人才的场所,为了实现教学和研究相结合,不仅在大学里要建立专业和学系,而且要设立与之相联系的研究机构。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为教学研究工作服务,搜集、储藏、流通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的书籍、报刊等文献资料。五是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包括出版专业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sup>[17]</sup>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也认为,学科建制要建立学科思想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并推进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学科制度建设任务。<sup>[18]</sup>可以看到,学科建制的本质是构建学术共同体,既包括共同体内部的共识增强,也包括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被外部环境认同。

与学科建制不同,学科设置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行政行为,是对学科划分的行政确认。由我国大学长期以来的单位体制所致,学科设置与专业开设、经费拨付、人员配置等密切相关。在国家层面,学科设置 also 具有很强的治理

意蕴和指挥意义。一个学科被设置为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在学科资源配置、社会观感和学术认同方面会有很大不同。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学科应该拥有与普通教育学同等的一级学科地位,<sup>[19]</sup>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进一步地,还应该看到职业教育学科设置与学科建制是互为因果、一体互涵的。一方面要积极争取把职业教育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对职业教育的学科建制问题也应给予高度的重视,“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对于职业教育科研尤其具有警醒意味。

第二,把“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等同于“职业教育理论”。理论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作为一种人为构建的知识体系,其主要作用是解释现实或揭示现象背后的作用机理。职业教育研究的驱动逻辑是问题导向,而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更多地受到政策导向的影响。无论是职业教育研究还是职业教育政策,都需要职业教育理论的导引。在职业教育科研实践中,存在以“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来代替“职业教育理论”的倾向。“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可以丰富多彩,层出不穷,但职业教育理论却必须保持定力,善于取舍。前者是开展职业教育研究的资源,而后者则是职业教育研究的本体性成果。正如道格拉斯·格林伯格和斯坦利·N.卡茨所指出的,如果说“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是“用眼来看”,那么职业教育理论的产生则应该是“透过眼看”,而真正的研究恰恰“不是用眼来看,而是透过眼看”。<sup>[20]</sup>职业教育科研要获得大的发展,无疑要吸纳外学科的滋养,但始终应该保持对“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职业教育理论”之间至关重要区别的清醒认识。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所言,“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不是由现有其他学科直接相加组成的‘团’,而是需要教育学研究者从不同学科中,作出与研究主题相关认识的重组与整合”。<sup>[21]</sup>吴康宁教授对此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sup>[22]</sup>他认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不是那种拿来的、叠加式的理论基础(如教育学的心理学基础),而应是建构的、整合式的理论基础

(如教育学的人学基础),关键不是当归、黄芪等单味药材的组合,而在于把这些药材熬制成能治疗某种疾病的膏方。在职业教育研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可以旁征博引、花样翻新、蔚为壮观,但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应该成为制造坐而论道、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泡沫和虚假繁荣的理由。真正能推动职业教育科研实质性发展的,是“职业教育理论”而不是或者不主要是“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职业教育科研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研究者精耕细作、春种秋收并真正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的“责任田”,而不是不假思索就任由外学科的所谓强势方法和时令概念跑马圈地、恣意驰骋甚至颐指气使的“殖民地”。

第三,把职业教育学研究等同于职业教育研究。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研究有两种基本范式,即:“日耳曼式教育学”和“盎格鲁式教育科学”。<sup>[23]</sup>日耳曼式教育学以德国为代表,主张把教育研究建基于哲学和伦理学基础之上,重在解释教学的一般原则和普遍原理。盎格鲁式教育科学以法国和美国为代表,主张引入社会学和实证方法,重在对具体的教育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形成经验性理论。代表人物有以约翰·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学派和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功能主义学派。受此影响,职业教育研究也逐渐区分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和职业教育学研究。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是现在西方主流的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无论是对专职研究机构还是对职业教育有兴趣的大学来说,职业教育研究无须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只要社会有研究需求,学者便可通过竞争性项目得到研究经费。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而职业教育学研究,更多的是学科导向的,希望建构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规律,并配备相应的教材体系、育人体系和资源体系。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职业教育实践伟大创新,我们既需要必需的职业教育学研究,更需要能实际问题、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议的职业教育科学研究。

第四,把学科独立等同于学科发展。由于我国教育研究长期以来的学科导向,教育学的

二级学科往往具有强烈的学科独立倾向。这种倾向的根源在于,独立才能自主,自主才能对所属的学科资源进行自由分配。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习惯性地强调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并以此作为学科独立的理据。事实上,从学理角度出发,这种观点越来越经不起推敲。作为一种跨界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对象并非职业教育学者的专利,其他学科照样可以研究。而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也很难说有某一种方法是职业教育研究所专有的。事实上,作为职业教育学的母体学科(之一),直到今天,也还有人教育学本身的独立学科地位持否定态度。谢弗勒就认为,“教育学不过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门学术性科目”。<sup>[24]</sup>彼得斯认为,“教育学至多可被称为各门学科的焦点或汇集处,教育学像医学一样,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门学科”。<sup>[25]</sup>与追求职业教育学科的独立性相比,更应该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学科的成熟度。在高等教育领域,研究取向正在经历从“多学科”到“跨学科”的方法论转向。<sup>[26]</sup>这种转向对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成熟和发展,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发育性痛苦”<sup>[27]</sup>具有启发意义。职业教育本身具有跨界性质,应该也天然地更适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独立,与其说应该作为职业教育科研的目标,不如说是学科足够成熟后的自然结果。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应更多地关注其成熟度和跨学科能力的提升,而非单纯追求独立性。

#### 四、提升职业教育科研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站稳“内立场”,解决职业教育科研“虚”的问题

“内立场”是叶澜教授在建构“生命·实践”教育流派时创生的概念。她指出,“一个学科,即使再开放,也不能没有学科边界,有边界就有内、外立场之别”,现在教育学的主要问题是“外立场强劲、内立场模糊,迫切需要研究者提升学科建设‘自觉’”,教育学的内立场“对于中国教育学者而言,包括以本土文化资源、学术积淀、实践发展为基源的教育学研究,这是教育学在

中国近百年来相对薄弱的“一个方面”。<sup>[28]</sup>叶澜教授的论述,指向的是整个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为疗愈职业教育科研“虚”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第一,坚定中国职业教育科研的文化自信。职业教育科研要祛除“虚”疾,首先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研究和阐释,坚定文化自信,站稳中国立场。作为一个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国度,中国职业教育文化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独一无二、弥足珍贵。以2400多年前的“班墨文化”为肇始,中国职业教育在造就灿烂器物文明的同时,也生成了具有强烈东方气质和鲜明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精神文化,这为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思想基础。当然,中国传统职业教育文化并非都是有利的、优秀的,科学的研究态度应是对中国传统职业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在赓续职业教育文化血脉中推动职业教育科研和职业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坚定职业教育科研的学科自信。与学科独立相比,更值得追求的是学科自信。在这方面,中国职业教育先贤黄炎培先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构建,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初的1918年,黄炎培先生就强调中国职业教育“本于自谋,非发于外烁”,<sup>[29]</sup>坚定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于西方职业教育发展经验,黄炎培先生兼收并蓄但绝不简单照搬,而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论证和甄别分析。当时很多人对美国、德国职业教育经验奉若神明,但黄炎培先生深刻指出,“凡创一制,但当问于我需要与否,可能与否,而不必问他人有行之者否,否则德又采谁者?美又采谁者?”<sup>[30]</sup>纵观黄炎培先生一生的职业教育实践,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基于理性和客观的自主自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当今时代的职业教育科研,应该继承黄炎培先生

自主自信的思想气质,树立利国利民的学术情怀,在“顶天立地”<sup>[31]</sup>上下功夫。在吸收借鉴其他学科、域外理论和发展经验的同时,保持科学态度、战略定力和内核稳定。

(二)研究“真问题”,解决职业教育科研“弱”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问题导向”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sup>[32]</sup>职业教育科研要由弱变强,关键在于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

关于真问题的判定,吴康宁教授提出了几组标准:“外在标准”与“内在标准”、“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利他性标准”与“利己性标准”。<sup>[33]</sup>真问题不应仅仅是实践和政策需要的问题,还要看能否与研究者的兴趣和实力匹配。匹配失败,就会产生“无根”的问题和“无望”的问题。面对“无根”问题、“无望”问题勉强为之,职业教育研究之弱就不难理解了。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职业教育科研迎来了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真问题。2024年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会议提出了15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包括立德树人、职业教育定位、产教融合、职普融通、职业院校的标准适配性培养规格、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综合高中、“新双高”、职业本科、“五金”建设、职业教育数字化、鲁班工坊认证标准、职业教育发展中国模式、职教出海、职业教育元研究,并提出了职业教育与升学的关系、职业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理念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职教体系与职校体系的关系。<sup>[34]</sup>以职业教育与升学的关系为例,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巨大政策应用需求的理论问题。实践中,很多职校的学生面临着升学与就业“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但事实上,之所以两难是因为目前的升学体系中片面地强调学术性,而对职业性兼顾不足。如果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高等教育能够提供学术和职业两种通道,那么就业与升学的矛盾将大大缓解。类似

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正是在破解这些真问题的同时,职业教育科研才能由弱变强,真正发挥“存史”“资政”“预警”“导引”的作用。

关于如何真研究问题,合适的路径是推动职业教育科研从多学科研究到跨学科研究转型。应拓展职业教育研究的学科视野,引入跨学科研究方法,增强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多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就同一问题提出各自的观点,本质上是单一学科研究的简单累加,而后者是将不同学科进行融合,通过化合作用打破学科壁垒,形成新的学科视域,实现理论整合。“多学科好比一床百纳被,跨学科研究就是一件无缝衣,多学科好比是混合物,跨学科就像是化合物”。<sup>[35]</sup>比如,“全球南方”语境下的中国“职教出海”问题,就很难说是一个纯粹的职业教育研究课题。需要整合教育学、外交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更加高远的站位和更加整全的视角,梳理凝练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基因、当代发展、模式特征和理念内核,为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三)生成“好话语”,解决职业教育科研“散”的问题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其中,学术体系是基础,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职业教育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话语体系建设。话语和学术的区别在于,学术更多地局限在学者内部,当学术研究的成果从学者群体走向社会公众,那么学术体系便变成了话语体系。如果说学术体系的传播载体更多的是专业期刊和学术出版的话,那么话语体系的传播更多地靠大众传媒和话题营造。学科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教学样态,学术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研究样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共同体对外传播的工具样态。<sup>[36]</sup>

话语体系是疗愈职业教育科研“散”问题的

一剂良药。第一,话语体系将给职业教育研究者带来外在的集体性舆论压力。我国职业教育实践发生了历史性、格局性的变化,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还是不高,职业教育科研的美誉度还是不够。如果说在具体的一些学术问题上学者之间容易产生分歧的话,那么当共同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压力时,学者群体自然会保持团结,并形成有一定聚焦度的成果。比如,在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方面,职业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部几乎没有分歧。更大的分歧出现在职业教育研究者与其他类型教育研究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第二,话语体系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对职业教育科研提出的必答题。近年来,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会、盟、奖、赛、展、刊”六大职业教育国际公共产品和一系列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在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亮相。鲁班工坊、中文工坊、郑和学院、丝路学院、班墨学院等一系列职教类国际品牌项目有力地展示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形象。这些国际化实践的创新发展,不仅为职业教育科研提供了广阔空间,也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在比较职业教育研究实践中,应该切实转换研究视角,把对国外经验的研究从国别译介升级为主题性、综合性、操作性分析,把对国内经验的国外推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伟大实践,中国学者比国外学者更有发言权,也应该有更强的责任感。

事实上,除了国际化,在“双师型”教师、职普融通等方向上,职业教育科研也可以为中国生成更多的原创标识性概念。从根本上说,职业教育科研的任务不是对包括德国“二元制”模式在内的世界职业教育经验进行一厢情愿、想当然式的简单夸赞,而是应该提炼形成像“二元制”之于德国那样具有世界影响力,同时又是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际传播话语及其体系。

#### 参考文献:

[1][34]2024年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召开[EB/OL]. (2024-11-18)[2024-12-28].<https://www.civte.edu.cn/info/1012/>

3598.htm.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DB/OL].(2024-07-21)[2024-11-30].[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2.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2.htm).

[3][10]郁建兴,黄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J].政治学研究,2023(3):14-24+167-168.

[4][16]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35.

[5]萧延中.什么是“问题意识”?如何培养“问题意识”?[EB/OL].(2024-11-28)[2025-03-18].<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1644.html>.

[6][8]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DB/OL].(2024-12-24)[2024-12-25].[https://www.eol.cn/news/zjyw/202412/t20241224\\_2647783.shtml](https://www.eol.cn/news/zjyw/202412/t20241224_2647783.shtml).

[7]刘守英,熊雪锋.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22(10):99-118+206.

[9][11][31]石伟平.以高水平职教科研支撑教育强国建设[N].中国青年报,2024-12-09(7).

[12]劳耐尔.国际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手册[M].赵志群,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05-19)[2024-12-12].<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14]胡明,路宝利.中国职业教育文化传统的解释与正名——“大器之谓”及其当代价值[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25):32-39.

[15]华勒斯坦,等.学科 知识 权力[M].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

[17]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J].社会学研究,1994(1):2-8.

[18]方文,韩水法,蔡曙山,等.学科制度建设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02(3):74-91+206.

[19]姜大源.基于职业科学的职业教育学科建设辨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11):8-16.

[20]道格拉斯·格林伯格,斯坦利·N.卡茨.学问生涯[M].吕大年,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9.

[21][28]叶澜.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3,130-131.

[22]吴康宁.“生命·实践”教育学为教育学赢得学术尊严[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5,7(3):11-15.

[23]黄志成.教育研究中的两大范式比较“日尔曼式教育学”与“盎格鲁式教育科学”[J].教育学报,2007(2):3-9.

[24][25]瞿葆奎.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342,278.

[26]汤晓蒙,刘晖.从“多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学科的方法论转向[J].教育研究,2014,35(12):24-29.

[27]王建华.社会科学方法论与高等教育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11):59-64.

[29]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57.

[30]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84.

[3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5-02-06].[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33]吴康宁.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兼谈“真”问题的判断标准[J].教育研究,2002(11):8-11.

[35]刘仲林.跨科学导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132.

[36]郑永年.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体系及如何构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12-17(1).

##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Proble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Yang Xuhu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 provides fundamental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while also pos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he emergence of the "fragmented," "weak," and "vague" issu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attention paid to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its historical legacy, and an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its disciplinary status. It is essential to stand firm on an "internal standpoint" to address the "vague" na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to study "genuine problems" to tackle the "weaknes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o generate "quality discourse" to resolve the "fragment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disciplin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problems; causes